

查理五世与德国宗教改革

张春林

查理五世当政时期正值欧洲社会大变革,在他统治区域内发生了欧洲近代国家形成、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发现和殖民地的建立等重要历史事件,其中尤为重要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目前人们对欧洲16世纪的历史研究更加重视,但忽视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在评价帝王方面,仍沿袭前苏联的传统观点,认为他们的作用或行为一概是反面的,尤其是对德国诸皇帝的评价上。在中国一些书中,有关查理五世的评价上就是如此,^①认为查理五世在德国宗教改革问题上始终支持罗马天主教皇和旧教诸侯,疯狂镇压路德教。其实这种提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有碍于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深入研究,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

在中世纪后期,不但农民起义和其他政治运动需要披着宗教外衣,一些国王或诸侯也利用宗教来处理国内重大问题。当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开始了加强王权的宗教改革,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对待国内宗教运动的政策也都是以是否对王权有利为出发点。他在国内镇压代表地方势力的新教,却支持德国的新教诸侯。这说明在一定场合,国家利益或政治利益占据重要地位,而对待新教和旧教的态度都以此为依据。查理五世也是如此。虽然他口口声声要建立基督教大帝国,并在加冕中宣誓要恢复帝国宗教秩序,但他是进入新时代的国王,出身于经济发达的尼德兰,德国宗教必须改革的现实不容忽视。德国的宗教改革起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反对罗马天主教教皇势力的精神压迫和经济剥削。教皇积极干预德国的内部事物,再加上德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没有统一市场等情况,使得德国社会处于分裂和落后状态。路德所提出的依靠信仰才能得教的教义,实质上并不是反对天主教,只是对其在德国出售赎罪券等腐败行为提出了质疑,即否定教会高于国家的思想,反映了民族利益,这是教皇所不允许的。查理五世的帝国形式上是神圣罗马帝国,至少被认为是代表着天主教的利益,特别是他的皇冠仍是由教皇戴到头上的,他有维护天主教利益的义务。后来教皇屡次向查理五世提出镇压路德异端,镇压德国农民起义和斯马尔卡登联盟都是以此为根据的。问题是,查理五世果真把镇压新教摆在重要地位了吗?仔细研究,事情并非如此。

^①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89—409页。

查理五世能够当选为帝国皇帝,并不是德国所有选侯和全德诸侯所情愿的,只不过是收买贿赂的情况下,利用德国诸侯之间复杂的矛盾才当上的。因此,对他的来说,管理德意志这个帝国本部不是得心应手之事。他在德国加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宗教问题。当时就路德所提出的宗教改革倡议,诸侯意见分歧,众说纷纭,教皇又无力直接干涉。查理五世加冕后从亚琛匆匆赶到窝姆斯,于1521年召开了第一次帝国会议。这次会议上,查理五世以公裁人的身份,作了比100多年前皇帝西吉斯孟德对胡斯更可靠的路德人身安全保证,并且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辩词。这次会议的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查理五世对路德不但没有“劝说”成功,相反,路德却更加坚持己见,还借助这次会议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并且堂而皇之地走掉了。查理五世虽然指责路德的观点为异端,但并未立即处理,而是以遵守诺言为名,让路德离去。只是在3个星期之后才公布《窝姆斯敕令》。敕令措辞似乎很严厉,声称他以及他的追随者的生命不受法律保护。^①但这只是官样文章,根本没有任何真正实质的处理,对教皇提出的一些要求也声言要安排在下次会议来解决;对诸侯借机提出的对教廷不满的共102条的意见更是没作出答复。紧接着他以西班牙事务紧急为借口,立即离开窝姆斯,返回西班牙。这种作法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按惯例,路德会象胡斯一样被处死,至少要受到监禁。

此后,无论路德的态度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所点燃的宗教改革的火焰却继续燃烧下去,各地诸侯、骑士、市民、农民和各级教士,都根据不同的利益,采取支持、观望、默许或反对的态度,以广大农民为主的下层人民借机掀起了起义。这场起义是被德国诸侯镇压下去的,查理本人并没有参加。9年后,查理五世又重新回到德国处理宗教问题。“但是甚至使同时代人感到吃惊的是,他并不是去执行窝姆斯敕令,而是带着和解态度设法解决两派对立矛盾”。^②1530年6月在奥格斯堡召开了又一次帝国会议。这次会议上,新教发表的纲领是路德的代表麦兰希顿起草的,主要内容有信仰得救、虔诚信徒才能进入纯洁教会、宗教仪式可以因地制宜、教士可以结婚,这无疑是新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纲领。纲领中还提出要纠正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弊端和丑行。新教的信仰者和支持者纷纷签名,这就是著名的“奥格斯堡信条”。在会上,罗马天主教教士以同等资格宣读了驳斥这个纲领的文章。查理在亲自听完两派的宣读以后,宣布后者的驳斥正确,并责令新教诸侯和信徒应放弃异端,归还占据的天主教教堂和教产。至于新教派提出的要教皇改正正在德意志的所有不当之处,查理也被迫答应他和教皇在年内召开的会议上商量解决。这次查理又作了空头许诺,他既没有监督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也没有召开许诺的会议。奥格斯堡会议的结果是使新旧教派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并成为定局。从此,旧教诸侯以贯彻查理五世的决议为借口,形成了一派;受到迫害的新教派诸侯以查理五世没有同意他们的起码要求和解决德国疾苦为借口,秘密结盟,对决议提出抗议(史称抗议者,即“新教”一词),在图林根的小镇斯马尔卡登召开会议,1531年3月29日宣布组成斯马尔卡登同盟。

此时帝国面临东方危机,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占领了整个匈牙利,率兵直奔维也纳,声

^① 海恩里希:《德国史——1517至1618年间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Herausgegeben von Heinrich Pletich, Deutsch Geschichte—Reformation und Gegenreformation 1517—1618),柏林1985年版,第83页。

^② 海恩里希:《德国史——1517至1618年间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Herausgegeben von Heinrich Pletich, Deutsch Geschichte—Reformation und Gegenreformation 1517—1618),柏林1985年版,第83页。

称要荡平德国。面对这种形势,查理非但没有能力镇压新教,而且如果没有新教诸侯军队的帮助,他也无法抵制奥斯曼的侵略。因此,在1532年8月,他召开了纽伦堡帝国会议,缔结了“宗教和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新旧教派双方同意暂不再采取行动,一直到下次宗教大会召开为止。实际上是在查理的调解下对新教诸侯采取了让步。新教诸侯很快向皇帝提供了8万人的军队,解除了维也纳的危机。宗教和平条约极大地促进了新教势力的发展,但双方并没有严格遵守。维也纳解危之后,查理又离开了德意志,一去又是9年,忙于他对北非和法国的战争。在此期间,查理五世于1535年在突尼斯打了胜仗,但在1541年的阿尔及尔战争中受到挫折。在此同时,法兰西斯一世和苏莱曼趁机联合起来,对查理展开了两面攻击,查理五世不得不再次寻求德国诸侯的帮助。因此,1544年他再次回到德国,召开了斯白伊尔帝国会议,重申“宗教和平条约”,并提出“保证新教徒应在这帝国法庭中享有同等地位,一直到下次宗教会议为止,他们是自由的。”^①查理五世作了如此让步之后,马上获得了4万军队。他以该支军队为主力迅速冲进了法国,逼近巴黎,法兰西斯被迫乞和,与查理五世签订了克莱斯白条约。

打败法国之后,查理五世又着手解决德国宗教问题。他请出新任教皇保罗三世,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并特殊地邀请新教诸侯代表参加,这就是1545年召开的持续18年之久的特伦特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参加者大多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高级教士。他们声称教皇与《圣经》具有同样的权威,极力维护罗马天主教的利益,只是决定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被严格禁止。新教教士拒绝参加会议。查理五世这时认为可以利用欧洲暂时的和平局势,率领旧教诸侯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所辖军队打败或者压服新教诸侯。

但是,这种武力镇压很难说成是完全出于宗教原因。把“斯马尔卡登”战争当成是或者不是宗教战争问题来探讨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宗教与政治在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中是不可分的。对于查理也是如此,镇压异端就等于镇压政治反对派。虽然斯马尔卡登同盟在世俗问题上愿意服从皇帝,但其联盟性质已经构成了一个政治原因,即“国中之国了”。^②查理五世正是为了阻止这种组织的形成才不得已最终动武的。而且教皇此时在西班牙给予查理许多让步,“教皇许诺提供军队予以支持,许可查理在西班牙征收教产税”。^③恰好这时新教内部发生分歧,行动不一致,其中主力萨克逊大公也临阵叛变,旧教诸侯在查理的率领下迅速集中军队。1547年,查理五世打败了新教军队,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查理为了保持势力的平衡,处理并不是惩罚性的。1548年,他发布了“奥格斯堡敕令”,允许新教教仪存在,教士可以结婚,但必须遵守基督教其他教规。有关宗教其他事项留待特伦特会议做出最后裁决。查理在德国的胜利,使得一些诸侯和邻国以及教皇深感震惊。教皇于是立即反目,不顾查理五世的反对,把宗教会议的地址从特伦特迁往波隆那。新教诸侯以及一些天主教诸侯在法国国王的支持下重新组成反对查理五世的同盟,并打败了他。经过谈判,1555年缔结了“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路德教取得了完全合法地位。查理五世实际上在1553年就离开了德国,其后的德国宗教问题主要是由费迪南代他处理。德国的宗教两派斗争一直到三十年战争后才告平息。

① 亨利:《德国国家史》(Henry Lodge, The History of Nations—Germany), 纽约, 第251页。

② ③ 哈通:《1519年至1648年的德国史》(Fritz Hartung,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1519 bis 1648), 柏林1917年版, 第36页。

二

宗教改革发生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并能够取得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纵观上述历史及查理的宗教政策,可以看出,他是以其帝国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为罗马天主教教皇服务。之所以如此,是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查理五世的德国宗教政策的起因。

(一)查理五世在入主德国时,德国人象西班牙人一样,把他看作外国人(尼德兰人或西班牙人)。在他竞选皇帝时,很多选侯就提出这一条加以阻止。但他在与法兰西斯的竞选中,他更有德国血统,因为他是先皇后代,而且有奥地利领地。尽管贿选成功,要想实际控制各诸侯还是相当困难。此前,几代皇帝都承认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以来所形成的事实,认可诸侯强大,由七大选侯择主。但黄金诏书的另一个作用是把教皇和德意志以外的势力排除在外,使神圣罗马帝国更具有德国的性质。查理五世的代理人曾在被选举的会议上签字并宣誓遵守下列条款:“如果没有诸侯的同意,皇帝不得结盟或同外国战争,也不得带外国军队进入德国;所有帝国官员必须由德国人担当;……如果无急切理由或相应的允许,皇帝不得对任何一个诸侯下任何禁令。”^①

随着英法西三个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德国也出现了这种统一民族国家的要求,宗教改革就有这种潜在意识。民族性的宗教,如英国国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统一的德国对查理五世是有利的。当时德国的诸侯要比西班牙的贵族强大得多,更难驾驭。查理五世的皇帝一职多属于虚名,他为了增强自己在德国的权力,就必须利用和处理好德国正在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他使用的办法是利用两大阵营的斗争来左右双方。无论是劝解、妥协和拖延都是为了控制德国,使双方都抱有幻想。他在对法国和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都得到了两派的支持,使得他在德国纵横近30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策是成功的。

查理五世之所以表现出倾向于天主教诸侯,还有其西班牙利益一面,是策略上需要。他在财力和人力上主要依靠西班牙。西班牙是天主教势力最大的地区。“查理所作的事情中没有比这更能激起他的西班牙臣民极大的热情。因为各基督教的王国(指西班牙各王国)把中世纪的捍卫基督教事业与新近的保卫教会的狂热传统联系起来。作为西方世界最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仇恨异端,希望路德运动被镇压下去。如果他们的国王能够用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保护教会免于异端的攻击,他们会给予他忠实的支持。而且他的外部事物如果带有捍卫他们信仰的性质,他们就会支持他在半岛以外的活动”。^②

(二)查理五世没有理由急于镇压新教。德国的宗教改革矛头首先是对准罗马天主教教皇的;由宗教改革导致的农民战争和斯马尔卡登联盟的斗争也不是指向皇帝,而且这些运动和他们的要求甚至有利于查理在德国的统治地位。

路德改革运动始终带有君权至上的思想。“路德首先原则上反对用暴力反抗世俗的政权

① 威廉:《史家世界史》(Henry Smith Williams, 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第14卷,伦敦1908年版,249页。

② 爱德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西班牙》(Edward D. Wightsalon, Imperial Spain)格林武德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7页。

……暴力仅可以用来反抗胡作非为的天主教教会的统治,甚至这么做是受欢迎的,但只有通过合法的暴力武装持有者来进行,即世俗政权。”^①路德在其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后,于1520年6月24日发表的第二篇著名政治纲领性文件《致德意志贵族书》中,一开头就写道:“崇高无比的皇帝陛下和可敬的老师们,深愿你们受上帝的保佑,以我这样一个渺小不足道的人,而竟敢上渎皇帝陛下和老爷们的尊所,并不是由于我胆大妄为,实在是因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德意志的各阶层都遭受着无比痛苦,陷于凄惨的境地。……许多次宗教会议已经指示一些改善办法,但是被这些人的阴谋诡计给破坏了,因此坏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我愿上帝来帮助我揭露这些阴谋诡计,使某些人不敢为非作歹,阻碍改革。上帝已赐予我们一个品质很高、年轻有为的君主作为我们的领袖,这便引起许多人的希望。我们有责任尽力帮助他。”^②与此相反,路德在该文中对罗马教皇进行了攻击,指出:罗马教皇方面人士很巧妙地建筑了三堵墙来抗拒改革,使基督教走向毁灭。这三堵墙是:教权在世俗势力之上;唯教皇有解释《圣经》的权力;只有教皇方面有权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力。路德在驳斥第一堵墙时指出:“所以我说:世俗权力是受上帝的委托来惩罚奸邪、保护善良的。因此我们应当让他们在整个的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是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者修士、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③查理正是用这种理论号召,召集两派参加帝国会议,并一手主持。

德国农民起义的特点之一是不反对皇帝,只反对诸侯。鞋会就是如此。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指出:“老百姓在他们的鞋会草案中要求德意志统一,要求只有一个皇帝,取消任何君主,老百姓认为,这样的改革只有自上而下通过暴力途径才能实行……。”^④1525年,希普勒在海尔布朗召开的农民军会议中提出的《帝国改革纲领》中指出,“所有受封地者为了基督教和与帝国的强盛,而为唯一的罗马帝国服务,要象《圣经》上说的一样,比对自己的其他封地领主更为忠诚。……最后,取消诸侯、领主和城市的一切同盟,各地应遵守皇帝的和平,没有任何过境税及其他课税。”^⑤对宗教方面的要求可在《十二条款》中看出:“农民要求拥有教区牧师的选择和免除的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基督教会的圣释和纯洁的福音。”^⑥农民起义是被诸侯镇压下去的,当时查理五世根本不在德国。

有人根据1550年颁布的《血腥诏令》笼统地说:“宗教改革运动与此俱来的社会运动限制了德意志皇帝在德国本部的重要地位,此后查理五世决定在世袭领地内严厉取缔宗教改革运动,”^⑦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是限制王权。诏令中虽然明确规定“朕禁止任何人刊印、抄写、持有、保藏、出售、购买及在教会内、街道上和其他任何地点散发”路德、慈温利、加尔文及其他异端文集,违者以罪论处。^⑧但这是指在尼德兰,并不在德国实行。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其前辈建立的,其对象是伊斯兰教徒,或是作为法律机构建立的,因而只是王权的工具。腓力二世时,宗教裁判所才在西班牙和尼德兰严格执行迫害异端任务。

① ③⑤⑦ 芳伯:《历史科学杂志》(Adolf laube, 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柏林1989年版,第11期,第977页。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第338、397页。

④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152页。

⑤ 彼得:《1525年以来的变革》(Blicke Peter, Die Revolution von 1525),奥登堡1975年版,第22页。

⑥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查理五世迫害尼德兰异端诏令的介绍”,第397页。

(三)查理五世与罗马天主教教皇有着深刻的矛盾。查理五世虽然代表着整个基督教的利益,但是,他是其世俗的维护者,也是进入新时代的国王,有其民族利益和帝国利益。他们之间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也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历史上教俗两主为了共同的统治阶级利益互相勾结和利用,但自始至终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尽管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各国专制王权的加强,教皇的权力和势力大大衰落,但仍不时插手各国事务,教皇国同意大利各国一样,形同君主国,教皇列奥十世就是美第奇家族人,美第奇家族把教会的高职看成他们世俗统治的工具。德国被称为“教皇的奶牛”,是教皇的最重要的财源。教皇不愿看到德国统一于皇帝麾下,但是对兴起的改革又无力镇压,不得不求助于皇帝。在查理五世竞选帝国皇帝时,教皇列奥十世极力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已经在意大利有着庞大的领地,对教皇国有包围之势。起初他支持选举法兰西斯,但当选侯们不愿选择一个法国人的时候,他又推荐萨克逊选侯,而且他是路德的保护人,越来越同情新教。“10月22日,新皇帝在查理大帝的故都亚琛加冕。列奥十世不情愿地勉强同意了这个选举……”。^①有鉴于此,查理五世上台后曾极力想控制教皇,并在列奥十世死后把自己原来的老师和亲密助手尼德兰的阿得连推上教皇宝座,即阿得连六世(1522—1523年),开了在罗马的教皇不是由意大利人担任的先河。但事与愿违,年老的阿得连不到一年就死了。接着上台的是克力门七世,又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人。

查理五世与教皇的矛盾不久就表面化。查理五世在与法王进行的一次争夺意大利战争中,在巴威亚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部下俘获了法兰西斯一世,并把他押往马德里。法王在做出许多许诺和保证后才被放回。但法王并不准备全部兑现诺言。查理五世的军队冲进罗马,进行了被人称为中世纪后期罗马遭到的最灾难性的洗劫。克力门七世实际遭到监禁。此后,远在西班牙的查理五世竭力为自己开脱,声称对罗马的洗劫并没有得到他的命令。但是后来许多史学家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著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指出:“肯定地说,查理五世的政府是打算给他一个严厉的惩罚的,并且在事先也不能估计他的不领饷的劫掠者会把这个惩罚进行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次的目的只是罗马,要在德意志招募军队而不给饷是完全办不到的”。“究竟这个皇帝是否真要把教皇属邦世俗化,和他是否真正由于英格兰的国王亨利八世的阻止而没有这样做,大概永远是弄不清楚的。”^②但查理五世却不敢直接控制教皇,因为“那些国王们不能容忍他们之中有谁把教皇看管者的权力霸占在手里……同时,那个皇帝甚至在西班牙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教士和贵族们只要一见到他就提出迫切的劝告,他不敢再继续虐待教皇,而且对一切外交政策的考虑,他也不能和被他人伤害过的教皇采取讲和态度。”^③

但是,查理五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以后的年代里,查理根据一个个帝国会议的方案,能够在一切主要问题上把教皇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既保护他又压迫他。”^④在欧洲问题上,查理五世还逼迫教皇不批准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同查理五世之姑卡德琳的离婚。查理五世在每次帝国会议上,几乎独断专行,涉及宗教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也不同教皇商量。虽然每次会议的结果没有使双方满意,但也不至于引火烧身。特别是在新教派提出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德国的腐败和压榨行为时,查理的答复却是留待下次会议解决,实际上承认了某些改革是必要的。查

① 米尔:《历史大事集 1468—1789》(Mill, Great Events From History, 1468—1789), 纽约 1984 年版, 第 65 页。

② ③ ④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第 120、122 页。

理五世在最后离开德国前,心情是这样的:“查德五世讨厌德国事务,深感无能力解决。他私下起草了一份文件,既批评德国的天主教派君主,也批评新教君主。他相信世俗诸侯不值得信赖,主教们对教会中的必要改革既缺乏必要的勇气,也不够关心。”^① 查理五世在每次帝国会议上所作的决定,表面上虽然维护了天主教大一统的利益,但骨子里打着宗教的名义为自己着想。

(四)客观上讲,查理五世也没有能力采取坚决的手段。“皇帝不想或不能对路德教采取禁止这一事实也许不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标志,很难设想这个新任和无经验的帝国统治者能够对这个国家实行比先辈皇帝更严的管束,查理也没有考虑采取那种步骤,他要的是和平与合作,而不是暴力。”^② 查理五世虽然在帝国会议上对新教采取比较严厉的法令,但并没有起作用。查理五世也没有能力操心去执行这些命令。因为就在窝姆斯会议刚刚结束之后,他必须奔赴西班牙,为了镇压那里爆发的起义和组织对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战争。所以,近10年间,德国诸侯自行其事。这意味着,窝姆斯敕令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皇帝的政令的执行还要看帝国的形势而言,那么现在就几乎不敢动武反对群众运动和制止路德言论的传播。首先,在德国镇压新教必然要进行长期战争,其次,查理五世在欧洲的主要敌手是法国,他与法国先后进行了4次战争,很难抽出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德国事务,何况他还要用兵对抗奥斯曼帝国的西侵。再次,新教势力是强大的,涉及的不只是宗教问题,这也正是查理更加趋向于旧教诸侯的重要原因之一。旧教诸侯也不愿意看到皇帝在德国的势力强大,因而经常倒戈。无论查理五世怎样自称是德国人的皇帝,他实际统治基础还是在西班牙,历史深远的德国统一问题不是他当时能解决得了的。总之,查理五世并不是宗教狂或顽固镇压新教的刽子手,他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利用矛盾,摆弄新旧两派诸侯,采取妥协、拖延和利用的办法,其目的是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总目的服务,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他能够在德国混乱状态中西战法国,东遏奥斯帝国,使自己成为查理大帝以来神圣罗马帝国最有势力的皇帝,后来的皇帝也没有比他更有势力的。

评价查理五世在德国的宗教政策,不能只看到其建立庞大帝国野心一面,也要看到建立强大皇权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当时德国人民普遍感到诸侯胡作非为,内斗不休。“权势较大的领主至少可以实际上不把帝国政府和它的谕令放在眼里。由于领主的残暴行为,领主和贵族的决斗,强盗骑士的劫掠,雇佣兵的抢劫和各种不法行为……德意志帝国最大的不幸正是缺乏一个在强有力的皇帝统治下的统一的政府,存在着弊端百出的多头政治,感受不幸的正是平民。”^③ 这正是当时德国社会的客观情况。

[本文作者张春林,1957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① ② 楚杜巴:《1519至1643年间的西班牙及其帝国》(Bohdan Chudoba, Spain And The Empire, 1519—1643), 纽约1977年版,第153、29页。

③ 威美而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8页。